

中 | 华 | 经 | 典 | 名 | 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文史通义

罗炳良 译注

【上册】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通义/罗炳良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2. 10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ISBN 978 - 7 - 101 - 08834 - 2

I. 文… II. 罗… III. ①史学理论 - 中国 - 清代
②《文史通义》- 译文③《文史通义》- 注释 IV. K092.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9738 号

-
- 书 名 文史通义(全二册)
译 注 者 罗炳良
丛 书 名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责任编辑 王守青 舒 琴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48 $\frac{1}{2}$ 字数 1000 千字
印 刷 1 - 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834 - 2
定 价 97.00 元
-





前 言

清代的乾隆、嘉庆年间，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出现两大发展趋势。一是乾嘉考据学发展趋势，产生出不少考据学大家，撰写的考史著作和考订的古籍更是汗牛充栋，在考证历史事实和考证史书讹误两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二是文史理论总结趋势，产生出以浙东学派史家章学诚为代表的批评性与总结性相结合的史学思潮，对18世纪以前的整个中国史学作了系统的考察与总结，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就，其重要特征是以探讨史学理论为主兼及历史理论，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而居于这座理论丰碑顶端的著作，就是章学诚的《文史通义》。

一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其生活与从事学术活动的年代，正值乾隆中叶至嘉庆初年考据学风靡全国的时期。他生活在这样一个举世崇尚考据的时代，却不追随流俗从事考证，而是针砭学术，探究校雠源流和史学义例，注定了其学问不被主流社会接受，在乾嘉年间默默无闻，一生穷困潦倒，却又性情孤傲，命运坎坷。但是，仕途的挫折和治学的寂寞也造就了他不甘屈服世俗、勇于另辟学术蹊径的顽强性格，生命不止，著述不辍，不仅为清代乾嘉时期的中国史

学开辟出一方新天地,而且对中国古代文史理论和治学方法论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章学诚少年时代资质并不聪慧,“二十岁以前,性绝骀滞,读书日不过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学为文字,虚字多不当理”(《章学诚遗书·家书六》,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同时身体素质也不是很好,“幼多病,一岁中铢积黍计,大约无两月功。资质椎鲁,日诵才百余言,辄复病作中止”(《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因体弱多病,时常废学。十五六岁以后,知识渐开,喜好泛览群书,在父亲章鏞的启发诱导下,开始对史学发生兴趣,曾经在塾课之余取《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试图按照纪、表、志、传体例编撰纪传体裁的《东周书》,已撰成百余卷,后为塾师发觉而终止。这为他后来专门从事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乾隆二十七年(1762),章学诚入京师国子监读书,因不谙世故,屡屡受挫。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始余入监舍,年方二十有五,意气落落,不可一世,不知人世艰也。然试其艺于学官,辄置下等。每大比,决科集试至三四百人,所斥落者不过五七人而已,余每在五七人中。祭酒以下,不余人齿;同舍诸生,视余若无物。”(《庚辛之间亡友列传》)当时只有沈业富、朱筠和朱棻元等极少数人了解章学诚,赏识其识解。沈业富俾其坐馆于家从事铅槧,朱棻元荐其与修《国子监志》,朱筠则招其入门受业。章学诚从朱筠问学,不仅得到朱筠言传身教,而且得交戴震、邵晋涵、周永年、洪亮吉等知名学者,学业大有长进。这一时期他治学的重点仍然在史学,“馆谷所入,自人事所需外,铢积黍累,悉以购书。性尤嗜史,而累朝正史计部二十有三,非数十金不能致,则层累求之,凡三年而始全”(《渝云山房乙卯藏书日记》)。在艰难购书的基础之上,章学诚开始深入研究纪传体史书。他说:“自少性与史近,史部书帙浩繁,典衣质被,才购马、班而下,欧、宋以前十六七种。目力既短,心绪忽忽多忘,丹铅往复,约四五通,始有端绪;然犹不能举其词,悉其名数。尝

以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约为科律，作书数篇，讨论笔削大旨。”（《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在京的十余年中，章学诚虽然屡试不第，蹭蹬科场，饱受世人讥讽，被人“视为怪物，诤为异类”（《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但却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从未动摇治史的决心，在学业上逐步趋于专精和成熟，为其文史撰述打下了基础。

乾隆四十三年（1778），章学诚经过七次科举考试，终于考中进士。然而他自知性格与社会格格不入，不敢走仕途之路，而以教读与著述为生。他晚年回忆自己“屡困棘闱，晚登甲第……自以迂疏，不敢入仕，文墨千人，前后奔走，几三十年”（《柯先生传》）。因为常常失职，生计无着落，不得不奔走各地谋生，足迹自京师而外，北到直隶永平府（今河北卢龙），西到陕西华州（今华县），南到湖北武昌府（今武汉市）、安徽亳州（今亳州市），流离患难，备尝艰辛。他后来回顾说：“自庚辰始赋远游，于今三十六年。余兹六尺之躯，亦备历崎岖险阻，颠倒狼狈，极人世可悲可愕之境，非一日矣。”（《谿云山房乙卯藏书目记》）在这三十余年中，他曾经主讲永平书院、清漳书院、敬胜书院、莲池书院、定武书院、文正书院，为地方官吏撰修《天门县志》、《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以及《史籍考》、《续资治通鉴》等书。坎坷多难的生活，寄人篱下的滋味，使得章学诚于“坎坷潦倒之中，几无生人之趣”（《与史余村论学书》）；加以“至论学问文章，与一时通人全不相合……知己落落，不过数人”（《家书二》），饱受精神上的压抑和苦闷。然而他并没有向命运屈服，反而迸发出向艰难困苦的环境抗争的极大勇气，经常是“江湖疲于奔走……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与邵二云论学》），始终不断地坚持史学义例和校雠心法的研究。尤其是晚年双目失明以后，仍然念念不忘著述之事，口授倩人代笔，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章学诚在学术实践的基础上，非常注重积累治学经验，总结校雠义法和文史理论。他自称“鄙于读书无他长，子史诸集，颇能一览而得其指归”（《与胡维君论校胡稚威集二简》），注重把握各家的著述宗旨；又

特别声明“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虽时有卤莽之弊，而古人大体，乃时有所窥”（《家书三》）。正因为具备这种学术素养，所以治学非常突出“鄙人所业，文史校雠，文史之争义例，校雠之辨源流”（《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的特色，撰写出《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两部成一家之言的史学批评理论著作。章学诚在这两部名著里表明了“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上辛楣官詹书》）的学术旨趣，形成了史学贵在著述成家的思想。他明确指出：“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藜芜。”（《与汪龙庄书》）在这部书里，最显著的特点是阐明史学家法和为史之意，辨析各种史书体裁义例，抨击治学各分畛域的积弊，宣扬史学经世致用的价值。同时，章学诚还把校雠学也纳入史学的大范畴。他指出：“学术同堂而异室者，知之不易。北宋史才，尹氏之识，二刘之学，已各不相蒙；南丰曾氏史学，本于向、歆父子，乃校雠之学，非撰著之才也。”（《知非日札》）亦即校雠学可以包括在史学范畴之内。他还认为：“获麟而后，迁、固极著作之能，向、歆尽条别之理，史家所谓规矩方圆之至也。”（《和州志志隅自叙》）这说明撰著之体和校雠之业都是中国史学的组成部分，同源而异流。因此，章学诚拟在《文史通义》外篇中作《校雠略》，作为内篇文史理论的羽翼之笔，这从《文史通义》内篇一《诗教》上下两篇的注文中可以得到证明。后来在撰写过程中内容不断增加，才扩充为一部自成体系的独立著作，定名为《校雠通义》。本书阐明了校雠学的目的与任务，考察了校雠学的起源和演变，提出了校雠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成为集中国古代校雠学之大成的著作，其中的许多理论见解都能和《文史通义》相互补充发明，是章学诚留给后人的又一部极其重要的史学理论著作。

二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章学诚无疑是一位以阐述理论见长的史学

家。他在史学上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表现出集理论总结之大成的特征,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重大的理论建树。《文史通义》在史学理论上的贡献和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发展水平来看,章学诚史学的某些理论是带有全面总结性的成果,达到了传统史学中理论发展的最高阶段。他在《易教》、《史释》诸篇阐述的“六经皆史”理论,继承元、明两代学者对于经史关系的认识,不仅超出了前辈学者的认识范围,而且给“六经皆史”学说赋予以史明“道”的含义,达到了古代学者认识这个问题的最高水平。他在《史德》篇提出的以心术论“史德”理论,不仅继承了春秋时期孔子主张的“良史书法不隐”、唐代史学批评理论家刘知几推崇的“彰善贬恶,不避强御”思想,关注史家记载历史是否能起到彰善瘅恶的借鉴作用,而且继承了南朝梁刘勰提出的“素心说”、明代胡应麟提出的“公心说”,然后继续探讨史家具备褒善贬恶的公心以后其历史认识是否即可完全符合客观历史实际,达到历代史家关于历史认识论中史家主体和历史客体之间相互关系理论的最高水平。他在《申郑》、《答客问》诸篇阐述的撰述与记注、史法与史意理论,是继承汉代司马迁、唐代刘知几、宋代郑樵等人的思想而来,阐明历史学必须具备撰述和记注两家之书,而史学家修史必须做到心知其意,运用别识心裁,真正达到史学成一家之言而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境界。可以看出,章学诚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做了全面总结,从这个意义上说,章学诚史学的理论建树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体系的成熟与终结。

第二,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发展进程来看,章学诚史学的理论成就具有承前启后特点。其中有些问题是继承前代史学的理论成就而来,并对后世史学的理论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在《书教》诸篇对历史发展中“时势”的认识,就是继承汉代史家司马迁、唐代史家柳宗元和明末清初史家王夫之等人重“势”的思想而来,而对19世纪史家龚自珍、魏源等人从“时势”方面着手考察清代国势衰弱,寻求改革社会积弊

思想的形成具有极大启示意义。他在《原道》诸篇对历史演变之“道”的认识，是继承唐代学者韩愈等人《原道》思想而来，并赋予其新的内涵，进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法则和规律，为晚清学者龚自珍提出“欲知道者必先为史”的主张架设了学术阶梯。他在《史释》、《浙东学术》诸篇对史学“经世致用”的认识，乃是继承唐代史家杜佑，特别是明、清之际的史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经世致用思想的精神而来，针对清代中叶传统文化史上汉宋学术之争作出实事求是总结和评价，藉以促进新文化与社会平衡的发展，这对于嘉道以后乃至近代学者在新形势下认识中西文化优劣和提出文化救国主张都有直接关系。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章学诚在前人理论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而产生的新认识，然后形成内涵较为新颖的概念，并且对后代史学的理论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中国近代甚至现代史学所继承和进一步发展。

第三，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发展形式来看，章学诚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有些内容侧重于总结客观历史发展的理论，他关于“时势”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论，关于“古”“今”历史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关于社会历史演变之“道”的理论，均为历史理论中极为重要的问题。而有些内容则侧重于总结史学本身的理论，他关于史学性质、史家素养、史学功用以及方志学义例中阐述的历史编纂学理论等等，都是史学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例如章学诚关于史书体裁之辩证发展的理论，和中国古代另一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相比，具有两点极其明显的特征。一是章学诚论史书体裁义例，并非以静态的方法，横向比较两种体裁之间的异同，评价其各自的优劣，而是用动态方法，在史书体裁的发展变化之中横向和纵向加以比较，不但看到了不同体裁之间各有利弊，而且认识到同一体裁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优劣。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把不同体裁综合起来分析，从而揭示出各种体裁之间相互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二是章学诚论史书体裁义例，并不过多地拘泥于史法，强调史书体例的纯正划一，而是从史法和史意两方面入

手,由史法求史意,避免以史意徇史法,灵活地看问题,形成了史书体裁辩证发展和演变认识,对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理论做出了新贡献。还有一些内容则偏重于总结史学方法论,他关于知人论世的史学批评方法论,提出史学批评必须考虑到被评价者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具体环境,不能脱离历史人物的社会背景而抽象议论评价,这在中国古代史学中是最具历史主义的史学批评方法论。

章学诚《文史通义》的理论内涵涉及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学理论、史学批评方法论等领域中的许多问题,可谓丰富多彩,内容广泛。只有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些问题,并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才能对章学诚史学有一个比较全面、客观的认识,得出更加符合其实际价值的正确结论,这对于全面认识清代乾嘉时期史学的理论价值,乃至进而认识整个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价值,并以此为借鉴,吸收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精华,丰富和发展当代史学的理论内涵,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理论体系,都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

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在生前曾经刊印,但因该书撰写时间前后历时三十年之久,某些计划撰写的篇章直到去世也没能写出,所以只能选刊一小部分,而无法包括全部,刊刻完本。由于他生前未及编定篇目,临终前委托浙江萧山学者王宗炎校订。王宗炎校订的《文史通义》篇目为内篇六卷、外篇三卷,其中外篇内容为议论、序跋和尺牍。王宗炎逝世后,章学诚次子章华绂认为“谷塍先生订定目录一卷,查阅所遗尚多,亦有与先人原编篇次互异者,自应更正,以复旧观”(《大梁本序》),于道光十二年(1832)刊定《文史通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并附《校讎通义》三卷,刊刻于河南开封,是为大梁本。章华绂刻本内篇已和王宗炎校订篇目有出入,外篇内容则完全不同,收录章学诚所撰写的各种方志序例。民国时期,浙江省立图书馆于1920年根据会稽徐氏抄本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n>)

文档名称：《文史通义 上》罗炳良译注.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n/post/1736.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